

doi: 10.3969/j.issn.1672-0598.2009.04.024

长安文化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

张金陵

(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 古代中国长安文化铺就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因佛教之教义较符合长安文化的一些哲学思想,所以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统治者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阐述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发展历程,并概述了一些翻译大师如安世高、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取得的非凡成就。

[关键词] 长安文化;佛经翻译;民族交融;和谐

[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9)04-0119-06

一、佛教东传的文化基础

公元前5—6世纪,佛教在印度诞生。佛教虽然产生于古代印度,但是其发展和传播却是在古代中国和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东方国家,如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等。而在其发源地印度,佛教却没有成为主要的宗教。甚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播都比佛教在印度要广泛。究其原因主要是佛教不太符合印度的民族文化。印度民族性格热情奔放、善于言辞、长于思辨、富于幻想,但时间观念差,而且多数人信奉的是早于佛教的印度教。“梵合同一”是印度教徒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使得印度教徒往往表现出重精神轻物质的倾向,这也是绝大多数印度人最基本的价值观,所以佛教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的华夏大地反而成了佛教传播的热土呢?答案只有一个,佛教符合古代中国的民族文化,而风行当时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正是长安文化,该文化铺就了佛教发展的深厚的社会基础。所谓文化,仅仅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趋向,联系着哲学、科技、思想、文艺、伦理、社会风尚等各个侧面,表现出一种主体意识。所谓长安文化,是指公元900年以前,中华民族以长安为首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结构,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公元900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精神。要理解这一时代的民族精神,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千年古都长安。长安,就

是今日西安,地处渭河冲积而成的关中平原,东临滚滚的黄河,周围拱卫着群山,内部沃野千里,物产丰富。人们探讨这里成为千年古都的原因,往往着眼于“险要的天然屏障保护着内部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这一现象,其实,在中国,符合“地险、国富”标准的地方并不少,长安之所以被封建王朝长期建都,还因为它位于中国的东西大道上。这样,中国的各部族在东西迁移的过程中,能在这里达到文化交融,从而找到共同的安居之所。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长安文化的成型,与大约四千年前西部的周部落迁入关中有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帝”作为人世间至高无上的神,有着无限的权威。这种权威因周人东进而发生动摇,周人联合各被压迫部族的人民共同消灭了强大的商朝,建都于丰镐(即长安城前身)。周人一方面宣扬过去尊奉过的“帝”,称之为“天”,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力量,他们相信“天惟时求民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样,天与人的关系就构成古代长安文化的核心,统治者一方面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另一方面也要讲“制天命而用之”。这时对于神的无条件服从已被否定,人的地位,人与自然的统一开始得到肯定,自然不但不再处处被看作是一种支配威胁人的神秘力量,而且在一定状况下还可以成为人的意志的体现。周代社会中氏族血缘关系密切,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政治上、

* [收稿日期] 2008-11-13

[作者简介] 张金陵,男,教授,在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任教。

经济上的统治与服从,而且还有一种与氏族血缘相联系的伦理道德情感。这样一来,个体与社会整体应当高度统一。人与人之间虽有亲疏贵贱,然而却共同尊奉一个原则,即相亲相爱。虽有阶级对抗,但“爱”仍不失为统治者协调其内部关系的重要武器。正因为有此思想基础,平王东迁、礼崩乐坏之际,才有崇尚周礼的孔子出来大声疾呼:“仁者爱人”。“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思想才能逐渐得到被肯定的地位,成为协调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由此看来,长安早期的周代文化,已奠定了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基础。正因为国家与氏族血缘、天人关系得到统一,所以,伦理道德有着极高的地位。基于氏族血缘观念,个体与社会整体不但不是互不相容,而且认为本质上就是统一的,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这种和谐的力量,又以荀子、孟子等人为代表的晚周民本思想而得到极大的发展。孟子继承了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但他痛感西周制度无法恢复,又为土地私有制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而苦恼,于是借用西周伦理道德,提出了协调“君”与“民”关系的主张,即“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也就是说统治者要想成为统治者,必须庇护民众。与孟子的思想相辉映,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种协调“君”与“民”关系的思想,也是长安早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天人关系等共同构成了长安文化的基础。

有了这么一种文化基础,再加上长安处于中国的东西大道的优越地理位置,佛教后来能逐步地传来并最终得到广泛传播,也就不难理解了。诞生在印度的佛教,它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对人的社会性的制约,则通过宣扬按照佛教的道德规则进行的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来实现。这些教义和思想比较适应于长安文化的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极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东周战国时期已开始有天竺(印度)或西域(现在新疆和中亚)的人来中国,华夏百姓开始知道有佛教这么一个东西。但当时,尚无翻译(笔译)只有通译(即口译)。“礼记”的“王制”上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革是’,北方曰‘译’。这是史书上第一次提到中国的翻译工作。不过所谓的通译也仅仅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根本谈不上佛经的通译。多数人对佛教并不太清楚,只是听西方来的人说佛教是可以渡人进极乐

世界,获得永生的仙法。这倒是很符合统治者和一些百姓想长生不老的愿望的。在无声无息之中,长安早期文化这一片沃土已做好了准备,静候着佛教的东来、生根发芽。

二、长安文化的形成和佛教东来

长安文化的形成,基本是在秦汉时期。秦人本属甘肃南部的羌族,公元前677年才将其都城迁到雍城,在这里发展起自己的文化。秦人进入关中后,虽然不可避免要受关中地区早期文化影响,但也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公元前403年,中原出现“三家分晋”的大事,这个长期不准秦人出关中东进的强国自己分裂,给了秦人争霸的机遇。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宣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结果使有作为的政治家商鞅遂从魏国西去入秦,开始了著名的变法,把秦文化、关中周文化与商鞅带来的中原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融合。公元前350年秦人迁都咸阳时,这种颇具时代感的秦文化得以巩固。虽然这种新的秦文化与秦人的传统文化多有抵触,然而它反映的是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户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统一全国的原因,史家多有评释,但对这种文化融合带来的优势,尚有忽视。举例说中国古代战争,本重车战。因为车作为进攻性的流动工事,适于农耕民族守土作战的习惯,以致中原地区车战盛行。但后来,北方少数民族送来骑战的信息,这些游牧民族骑在马上,纵横厮杀,较车战灵活,较步战凶悍,代表着时代的潮流,迫使农业民族迅速接受他们的挑战。而秦人本来就是西方少数民族,与羌族有着血缘关系,所以大批羌族人培养的良好马——河曲马进入秦军,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我们看到的战马就是河曲马。我们在这个陶俑坑中还可以找到与战车部队排列在一起的骑兵俑,这说明骑兵这一新式军事作战手段最先由秦国用于战争,有了这一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秦人得以打败六国的战车、步兵,进而统一全国。我们当然不能说骑兵是秦统一中国的唯一原因,但却不可否定它的作用,从而也就必须承认这种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所带来的巨大优势。秦文化相较周文化多了一些新因素,氏族血缘关系稍有降低,人与人之间和谐的道德观念面临考验,君主集权政治日益强化。秦朝所信奉的思想,是韩非所提倡的法家理论:“君上之于民”,“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

也”。这就把周文化中的“君”与“民”的关系作了重大修正,早期的民本思想被赶出了正统思想圈,君权至上,成了一时的社会风尚。这样一来,长安文化便充满了危机,佛教的东进也受到了阻碍。

继承秦王朝的西汉王朝,是来自长江流域的楚人所建立的封建政权,这使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楚汉文化获得全面交融的天机。长江流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起源。虽然中原各国人视楚国为“南蛮”、“荆蛮”,但楚国的强盛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于是,楚人文化得以相对独立地发展。长江流域不象关中地区那样有四塞之固,有群山拱卫。江水一泻千里,为楚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于是,宗法制等级观念稍显薄弱,原始的自发性自由精神显得生气勃勃。楚人习惯于想象,尤其喜欢幻想,此风格后人谓之“楚风”。现在,这种富于生气的文化来到了西汉长安,与周秦文化一起充实长安文化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汉代长安文化才可能有那雄伟的气势,扩张的精神,大胆的梦想,以及兼收并蓄的能量。汉代长安文化作为周、秦、楚人文化的交汇,在汉武帝时达到激烈交锋的程度。一派以董仲舒为代表,他看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实”,想到了秦末农民“伐无道,诛暴秦”的后果,又要为汉武帝建立统一帝国的目的献策,于是再度运用早期长安文化的“和谐”手段,改造儒法二家。他摒弃了法家君权至上的主张,改为“天人感应”即“君权神授”的概念。这样一来,“天”或多或少对君主的权力有所制约。既然天具有道德和人格意志属性,那么天人关系就不能不是一个被认真对待的问题。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相互渗透性,逐渐形成长安文化的重要特征。另一派以司马迁为代表,这位坚信历史可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的哲人,与唯我独尊的汉武帝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受宫刑是封建制度对他的肉体摧残,然而又使他的思想得以升华。司马迁思想的主体,是周代文化后期的民本意识,他对孔子怀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情,推崇智、仁、义、勇、行等儒家准则,但他又不赞成儒家的“中庸之道”,向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充满爱憎分明的斗争精神。《史记》以人物为历史活动的中心,描写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尤其是一大批敢于与强暴抗争的下层人物形象,体现出尊重个性自由的趋向。建功立业与个性自由的要求交织在一起,使得《史记》代表的西汉长安文化充满了豪迈的气度,这时的人们一方面

有了社会责任感,一方面又不忘个人的地位,可以说周秦文化的协调能力与楚文化的自由精神在《史记》中得到了巧妙的结合。司马迁全力以赴,反复推敲,写成《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将它作为人的理想性与现实冲突的最后结果。如此,西汉长安文化虽然可以看到大一统封建帝国对人的压抑,但更多的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其主流是那振奋人心的宏伟气魄和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由此看来,楚人文化与周秦文化的交融获得了成功。中国的东西南北、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大融合,终于促使长安文化形成,这是一种古今中外各民族大交融、大吸收的混合型、开放型、进取型文化,是千古不衰的汉民族传统意识与心理结构。

此时到东方来的天竺或西域的佛教僧人日益增多,华夏土地上接受佛教思想和教义的人也越来越多。佛教传到中国后,其传播多是靠外来僧人的口传身授,据史书记载,早在西汉哀帝时代(公元前6年至公元1年),就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口传一些简短的佛经经句。另一途径就是通过佛经的翻译。古代佛经的翻译初期主要也是靠外来的传教僧人,古代佛经“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不听载文”。通常有两种翻译方式:一是先把梵文记录下来,再译为汉文;一是口诵以后,由传言的人译为汉文。这个时期的佛经翻译基本是民间私人翻译。天竺西域僧人来到中国,只要有人请他译经,他便可以从事翻译,随时随地,不问人选,组织很不完备。佛经史册中称之为“传言译语”、“度语”、“翻”等。据考,这是“翻译”一词的最早起源。“译者,手执胡本口宣出”,“笔受”(即笔录翻译者)在后。参与翻译的大体可分五种人:口授或执胡本的译主、度语(或称传言译者)、笔受、参校以及劝助者(出资人或照料译事的人员)。这时期的翻译错误很多,比如,传言的人不能体会译主的意思,自然无法传出佛经的精神;笔受的人常常不是失之直译,便是失之意译,同样不能把译品用确切的辞句表达出来。后来,到了东汉朝代,有的东来译主会说汉语,翻译困难就大为减少。东汉属于佛教大举传入的时期,佛教活动以翻译经典为主。关于最早的汉文佛经是什么的问题,学术界中一直有很大的争议,不少人认为是《四十二章经》。据说是汉明帝(公元59—76年)遣使从西域大月氏国取回,现存版署款为“迦叶摩腾并竺法兰共译”。此经由四十二段很短的经文组成,主要内容是关于佛教的一

些基本概念,如抑制欲望,十善十恶等。汉桓帝时(公元147—168年)安息国安世高和月氏国支娄迦讖,译佛经数十部,约一二百卷。安世高,本名清,字世高,原为安息国太子,由于受佛教“苦”“空”理论的影响,厌弃世俗生活。其父死后,安把王位让给了叔叔,自己出家修行。安世高博学多才,“游方弘化,遍历诸国”,“通习华语”。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来到洛阳,开始汉译佛典,主要译小乘的经典,如《四谛经》、《人生本欲经》、《转法轮经》、《八正道经》、《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等。他较早地把佛教的一些基本观念介绍到中国,对佛教在中国最初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支娄迦讖简称支讖,古代月氏国人,“汉桓帝末(公元167年),游于洛阳。于灵帝光和、中平之间(公元178—189),传译胡文”。支讖是最早把印度大乘佛教般若学的重要经典译成汉文的人,为后世玄学思想的先导。所译经典如《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等。“阿弥陀佛”一词,就是通过汉译《般舟三昧经》引入中国,且流传至今。对其翻译质量,道安如此评价:“因本顺旨,转音如己,敬顺圣言,了不加饰。”意思是支娄迦讖的翻译以直译为主,遵循原意,但文字欠华美。

三、长安文化的确立和佛经翻译

公元三至九世纪,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长安文化大放异彩的时代。古今中外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大吸收,终于确定了长安文化的特定内涵。

东汉时期,长安一度失去国都地位,左右政局的世家大族,一般也不在长安,于是秦汉时期形成的长安文化,开始因大量西北游牧民族的内迁而发生变化。这些游牧民族用野蛮力量冲击了秦汉长安文化,但也确实为长安文化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如前秦苻坚曾听从王猛建议迁燕地王公百官鲜卑人四万余户入长安,又迁关东豪强和其他少数民族十数万户到长安与关中。各民族住在一起,相互间的文化交流渗透扩大,促使长安文化有别于洛阳及南朝地区的文化。例如中国古代的坐床,本与席地而坐的早期习惯相联系,为区别人的尊卑地位,尊长坐床,从属则设单席于地。古代中国人的坐是跪下来坐在自己的腿上,然而西北牧业民族却是和今日一样坐法,于是他们使用的胡床,传入内地。是尽管当时中国人已普遍使用胡床,但在正规场合,仍然保持旧式坐床方式,尤其在南朝首都建康,这一风气最盛。而长安地区,胡床使用普遍,以致宫

内还出现了胡床的发展物——大绳床。

佛教东来也对长安文化的确立有着重要影响。十六国时大量笃信佛教的西北少数民族内迁,佛教一时异军突起,佛图澄以报应说劝后赵石勒、石虎省刑杀,颇得人心。图澄的弟子道安(又名释道安,公元312—385)以内佛外玄文学,活跃于南北两朝,公元375年后留居长安,在前秦苻坚的支持下大规模译经,长安开始成为南北、中外、古今文化的交汇中心。佛教初传中国时,所译经典质量不高,原因之一是由于译者对梵文省略句,倒装句的理解不够,所以让人感到“胡言尽倒”、“胡言乱语”,“每至滞句,首尾隐没”。早期译经多用直译、音译,也造成名辞艰涩,文意阻滞,“致使深意隐没未通”。道安到达长安后,召集中外名僧,组织建立庞大的译场,大量翻译佛教经典,“译出众经百万余言”。道安亲自与西域僧人诂定音字,详核文旨,提高了译经质量。从翻译学的角度看,道安的功绩在于他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翻译理论,建元十八年(公元360年前后),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要领。

当时佛经翻译最著名的是印度名僧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前秦皇帝苻坚听说有位名僧鸠摩罗什在西域龟兹国宣扬佛教,于是就派遣将军吕光率领大军,西征龟兹去请鸠摩罗什大仙。等到吕光征服了龟兹,请到鸠摩罗什准备返回长安,不料这时前秦发生内乱,姚萇杀了苻坚自己当了皇帝。于是吕光就乘机占据龟兹自称凉国,鸠摩罗什也就留在了凉国。后来姚萇的儿子姚兴当皇帝,打败了凉国,这才把鸠摩罗什迎入中原。后秦皇帝姚兴亲自迎接他到长安,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经,从而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办性质的大规模佛典译场。姚兴十分崇敬鸠摩罗什,待以国师之礼,还专门派了几千人协助他翻译佛经。鸠摩罗什在长安讲学时,因为“口译秦语,曲从方言”,以至远近聆听者五千余人,各州郡“事佛者十室而九”。在鸠摩罗什主持下翻译的佛经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译经总数为35部,共297卷。此前,汉译佛经“多滞文格义”,“不与胡本相应”。“罗什所译,义皆圆通”,“众心惬服,莫不欣赞”。他的翻译以意译为主,侧重领悟佛典原意,不很注重译文与原文结构类似,故内容或时有增减。他很注意修辞,译文流畅,极有文采。译本在中国流传广,影响大。直至今日,许多仍为通行本,如《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

南北朝梁武帝时代(公元502—546年),应梁武帝之聘,一个名叫真谛(公元499—569)的印度佛教学者来到中国,译了49部经论,计142卷,以大乘瑜伽宗为主,如《金光明经》、《摄大乘论》等,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的影响。由于佛经的翻译中有大量的中原文化人参加,其中不乏儒家和道家学者,所以在佛经的语言和解释中就融入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加上佛教本身具有培养和教育人的思想与中华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很吻合,所以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两种思想不断交映,相互融通。在这传统儒家思想无力协调社会矛盾的时期,佛教的因果、来生、报应、思辨诸论,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使得各割据政权“莫不崇尚”。统治者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反过来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佛之东来,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潮流,为长安文化的确立,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

佛教在长安立足,是古今中外文化大吸收、大融合、大提高的重要标志,通过对佛教在长安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长安文化的历史。隋唐两代译经的方式已有改进。隋炀帝时就开始设置翻译馆和翻译博士,当时的高僧释彦琮(俗姓李,公元556—610),尤精于译事。他的梵文造诣很深,译经23部,共100余卷,晚年著《辩正论》,作为翻译佛经的准则。他提出佛哲传经,深浅随缘,译事不易;虽精心审度,仍难臻恰当,为求圆满至善,宜有八备十条。所谓八备,就是参预译场的人所应具备的八种条件,可归纳为三项:一是译者必备的某些操守;二是说译者需精通佛学;三是要求译者需精通梵汉诸学。所谓十条,则为翻译的十条注意事项,即“字声一,句韵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

当然,在佛经翻译中做出最大贡献的应是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公元602—664),他与鸠摩罗什和真谛一起被称为我国佛教界三大翻译家。他为了解决“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的佛性问题,西行去印度求法,17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657部,并将译经、讲学、授业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佛教研究中心。只是玄奘所创的“法相宗”,强调因明辨识,“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体现了印度后期佛教大乘有宗的哲学体系,并不能适应中国的现实。于是虽然显赫一时,三四十年后逐渐消失。曾参加玄奘主持译经工作的法藏在“因笔受、证义、润文见识不同而出译场”后,认为“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为迎合武则天的政治需要的创华严宗,以

“一真法界”的本体论,“法界缘起”的认识论,在长安城获得极高的地位。而只要口念“阿弥陀佛”即可“延年转寿,长命安乐”的净土宗,又将佛教普及入民间。最后,与士大夫修身养性观念最为相似的禅宗风靡长安,标志佛教的中国化完成。这种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佛教,宣传佛性在心,只要心外无物,即可“领悟成佛”,与封建士大夫修身养性、治国治心的要求相适应,成为长安文化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各国、各地、各民族都能在长安最后趋同一致,所以,隋唐时期长安文化获得确立。秦汉时代那种雄伟、强劲的征服精神,再加上了奔放的情调与“和谐”气氛,这就是长安文化的主要特征。

这个时期的佛经翻译已经开始规模化、系统化。有了专业从事翻译的人,有了译场,也有了翻译标准。取得了非凡成就的除了上面所说的几位外,还有朱士行、法显等。三国时代不仅有外国僧人来华传法,也开始有中国僧人出国取经。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者是朱士行,他也是汉地第一个受戒成为比丘的人。朱士行(公元200—285),颍川(今属河南)人,少年出家,立志弘法。读旧译《道行般若经》(小品)“往往不通”,深感“译理不尽”。当他听说西域有大品般若经后,“誓志捐身以迎大品”。于是他于甘露(公元265年)年从家乡起程,出维州,涉流沙,到达于阗国(今新疆和田)。“果写的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朱士行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无力返故乡,遂遣弟子将所抄所译经文运回洛阳。朱士行翻译佛经早于道安,严格地说,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代中国或东土的第一位翻译家,在他之前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安世高和支娄迦讫等都是外来的僧人。东晋时期,又出了一位西行求法的高僧法显(公元335—423)。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属山西)人,幼年因体弱多病而出家。有感于律藏汉译未全,决心西行求法。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年愈古稀的他告别长安,涉流沙,越葱岭,历尽艰辛,途经30余国,用了六年时间方抵达中天竺。此前,西行求法者虽众,但真正到达印度,法显为第一人。法显在印度朝拜圣迹,学习梵文,抄写梵文佛经。六年后又去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两年后带着大批梵本佛经从海路回到中国。法显出国时同行同学十数人,或死,或留,或半途而返,仅他一人满载而归。回国后法显投入了繁忙的译经事业,且卓有成就,“定出六部,凡六十三卷,垂百万余言”。但法显的成就仍难以与玄奘相

比。唐朝玄奘不仅以精通梵文和中文的优势来从事直接翻译工作,且做事态度更为认真严谨。他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在19年间译出75部佛经,共1335卷。翻译《大般若经》时,梵文有二十万颂,文字过于冗长,同事屡请删略,他本有接受之意,后想到像鸠摩罗什法师那样的除繁去重,总不妥贴,还是一字不遗的把它译出了。当时经本受南北朝影响,流行晦涩难懂的骈文体,他毅然采用朴素的通俗文体。故他的翻译不仅真实地传达了佛教的内容,同时也影响到唐代文体的改革。玄奘法师不仅把佛经译成中文,还把《老子》的一部分译成梵文,传入印度,他也是把中文理论著作介绍到外国去的第一人。玄奘对于翻译理论的建立,也有突出贡献。他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也提出了“五不翻”理论:“一、秘密故不翻,陀罗尼是;二、含义多故不翻,如簿伽梵含六义故;三、无此故不翻,如阎浮树;四、顺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实可翻之,但摩腾以来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令人生敬,智慧轻浅,是故不翻”。

玄奘之后仍有不少的佛经翻译大师,如实叉难陀、菩提流志、不空等,但最著名的是义净(公元636—713),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37岁的义净,由海道到印度去求学。他历时25年,游历了30多个国家,学习了丰富的佛教典籍。他在那烂陀寺就历时11年,亲近过那烂陀寺宝师子等当时著名的有德高僧,研究过瑜伽、中观、因明和具舍,并和道琳法师屡入坛场,最后求得梵本三藏近400部,合50余万颂。公元687年,他回国归途中重经室利佛寺,在那里停留了几年,从事译述。公元695年,归抵洛阳,受到盛大的欢迎,住在佛授记寺,

主持翻译《华严经》。当时,他回国带回了梵本经、律、论近400部,合55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300粒,轰动一时,以至武则天亲自带人到东门外迎接他,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殊荣。之后,他才正式组织译场开始翻译佛经的工作并亲主译事,直到公元711年为止,译抄经典并撰述共61部,239卷。

长安文化时代是中华民族取得伟大成就的时代。佛经翻译即是我们先辈的成就之一。两千年来,佛教的思想和教义已成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始终是民族前进的动力之一。长安文化的开放和进取性使它吸收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古今中外各种营养成分,从而使我们的民族雄踞东方。继承与发扬这一传统,中华民族将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开创更为伟大的前程。这是我们讨论长安文化和古代佛经翻译所得到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张培基,等.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 [2] 钱歌川. 翻译的基本知识[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 [3] 李利安,等. 中国高僧正传[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 [4] 金堤,等效翻译初探[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8.
- [5] 方梦之. 译学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6] 马红军. 翻译批评散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0.
- [7] 思果. 翻译研究[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1.

(责任编辑:杨睿)

Chang'an culture and Buddhist sutra translation in ancient China

ZHANG Jin-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and cause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hang'an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It is this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e that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rowth of Buddhism in China. As the Buddhist doctrines complied with some philosophical ideas of the Chang'an culture, they were easily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Rulers made use of Buddhism to consolidate their regime, which also promote Buddhism's growth. The paper simultaneously expounds the process of the Buddhist sutra translation, and outlines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by some translation masters such as An Shigao, Dao'an, Jiemo Luoshi, Xuanzang.

Keywords: Chang'an culture; Buddhist sutra translation; nationality blending; harmony